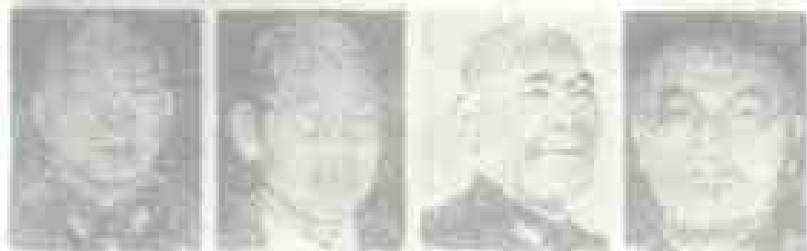


东京审判



K152

20

8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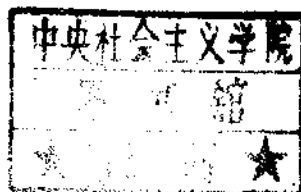
东 京 审 判

(苏)Л·Н·斯米尔诺夫 Е·Б·扎伊采夫著

李执中 史其华 林淑华 译

杨 柏 青 校

82012



200205036

军 事 译 文 出 版 社

一九八八年八月

东 京 审 判

(苏) Л. Н. 斯米尔诺夫 E. B. 扎伊采夫著

李执中 史其华 林淑华 译

杨 柏 青 校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印张: 16 6/8 字数: 375,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3次印刷

ISBN 7-80027-043-3/E·13

定价: 7.80元

译 者 的 话

《东京审判》一书是根据苏联军事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СУД В ТОКИО》（修订第三版）翻译的。作者Л·Н·斯米尔诺夫曾以苏联公诉人的身份，Е·Б·扎伊采夫曾以国际法专家和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工作。后来，斯米尔诺夫担任过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院长等职务。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对日作战的十一个国家（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各派一名法官组成。我国参加这一审判工作的法官是法学博士梅汝璈先生（此人从一九五〇年起在新中国外交部工作）。此外，我国法律工作者倪征映、向哲浚、杨寿林等人也以公诉人和工作人员身份参加了审判工作。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使命是审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所犯的三种罪行：一、破坏和平罪；二、战争犯罪；三、反人道罪。据此，对日本主要战犯东条英机等二十八人进行了审判。审判工作从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开始，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结束，历时约两年半，共开庭八百一十八次，对东条英机等二十五名战犯（另外三名战犯中的两名在诉讼过程中死亡，一名因患精神病，丧失刑事责任能力）做出了公正的判决，严

厉惩罚了战争罪犯，为人类伸张了正义。

《东京审判》一书中再现了当年东京法庭上的许多重要场面，根据日本官方的大量绝密文件、重要证人的证言和被告人的供词，无情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过程中极其秘密的阴谋活动以及在中国、远东、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书中收入的许多历史资料是我国历史书籍中未曾见过的，因此本书对了解、研究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翻译本书时，删掉了原书中一些不必要的和同事实有出入的个别内容，同时，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增加了一些注释。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可能有差错，敬请读者指正。

目 录

一、阴谋家开始活动	(1)
二、未上被告席的人	(30)
三、询问伪皇帝	(70)
四、七个“殉难者”中的一个	(98)
五、不成功的塔列兰	(147)
六、军国主义分子的中立	(237)
七、末日来临	(268)
八、战争罪行累累	(439)

东 京 审 判

一、阴谋家开始活动

由于历史的风云变幻，两件看来意义不大，当时不甚引人注目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满洲的奉天（今沈阳）。这两件事划出一个时代。当时许多人认为，这是个天昏地暗的时代；在那乌云密布、血迹斑斑的人类历史上，这是个史无前例的血雨腥风的时代……

1928年6月3日夜，北京车站已空荡无人。一辆专列的花车旁站着三个人：张作霖大帅、他的日本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将军及副官土肥原贤二大佐（也是日本人）。列车很快就要启程。张大帅同那些因紧急事务留在北京的伙伴告别后，走进了花车。列车徐徐开动了。尾车的红色信号灯最后闪亮一次，就在转弯处消失了。当时，松井七夫和土肥原从容地走出车站，乘车返回。第二天他们也要去奉天。

但是，他们再也见不到张作霖了，因为6月4日这列专车到达奉天郊区时，发生了爆炸事件。尽管列车开得非常快，但爆炸恰巧发生在花车到达的那段铁轨上。张大帅和他的随从人员全部遇难。整个列车未受损失，只一节车厢脱轨。

那场灾祸有种种异常情况，这使人有理由认为，那是有

经验的破坏者干的。

张作霖的葬礼很隆重。灵柩安放在炮车上，几匹马拉着灵柩缓缓地通过了挤满观望人群的整个奉天大街。同张大帅儿子张学良并排走在前头的是日本政府殡仪代表团团长——男爵林权助将军、张大帅的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和驻满洲日军司令官本庄。参加送葬的有驻满洲日军司令部的许多军官，其中有河本大佐和七尾的副官土肥原大佐。

只有一个人没来悼念张作霖，尽管按他的身份应当来。这个人叫大川周明，是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理事会总裁。据说，他由于惊吓而病倒了，因为惨杀张大帅这一事件恰巧发生在他的会社所管辖的铁路同另一条通向北京的铁路相交的地方。读者自然会发觉，这种离奇的巧合未必能成为那种强烈惊吓的理由。大川可能是个神经脆弱的人，这使他的行为举止出现许多奇怪现象。例如，众所周知，他虽是个世界文学爱好者和精通者，却不尊重莎士比亚，认为他的许多戏剧有很多情节不足信，那些凶恶残暴和厚颜无耻的行为太过分了……

东京各家报纸当时就张作霖的死报导：日本的挚友死了，他成了中国恐怖分子的牺牲品。日军参谋部对这个事件发表的意见更为明确。他们在通告中指出：张大帅是被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游击队杀害的，因为张大帅直到遇难前还同南京政府进行毫不妥协、不惜牺牲的斗争。

当年的世界舆论已习惯于中国军阀们忽而飞黄腾达、忽而败北下野的现象，因而认为这个事件没有多大意义，况且死者的历史又极不光彩。

二十世纪初，满洲地区武装罪犯猖獗，他们结成一股股

匪帮，绰号为“红胡子”。那些匪帮中有一伙的头目就是张作霖。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日军统帅部利用满洲土匪袭击俄军后方，犯下桩桩血腥罪行。张作霖是当时为日军效劳的首批土匪之一。这就决定了他尔后的生涯。他成了日本的宠儿，以后又加入中国军队，并且官运亨通。1916年他在其主子的唆使下，曾企图宣布满洲独立，把满洲变成象朝鲜那样的日本殖民地。

北京政府急忙任命他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以此使他暂时忠顺。但是，张作霖虽未宣布形式上的独立，可实际上很快就成为东京的奴仆，而不是北京的奴仆。这个擅长钻营的大帅，随机应变，看风使舵，到1928年不仅控制了满洲，而且控制了北京，并把他的官府迁到北京。1928年夏初，国民党军队战胜了北洋军阀及支持他们的日本部队，逼近北京。张作霖知道自己支撑不住局面，就决定回满洲。他的这项决策违背了他的日本朋友的劝告，于是很快就被害死。

当时谁能想到，这个事件竟是实现破坏和平的阴谋诡计的第一步。这个阴谋诡计当时在远东已经酝酿成熟，若干年后得到欧洲中心出现的类似阴谋诡计的参与者们的有力支持……当时谁能预见到，中国一个大军阀之死竟是踏上第二次世界大战途程的第一步，虽然只是一小步。

17年后，一场熊熊战火的最后几点火星熄灭了。1945年8月19日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猛打猛追进行抵抗的关东军，逼近奉天。为了侦察和夺取奉天机场，苏军决定使用空降兵。运输机在歼击机的掩护下飞向奉天。飞行时间很短，一座城市豁然展现在异常平坦的大地上。歼击机在城市上空掠过，日军高射炮没有射击。飞行员平安地察看着机场。一些

身着军服的人在烧毁的飞机残骸之间的草地上奔来跑去。

歼击机中队长确信敌人不再抵抗后，用无线电指示运输机着陆。200名近卫军空降兵布满了空荡荡的机场。他们的指挥员显然是个老练的军官，他立即就发现在许多烧毁的飞机残骸之间，有一架完好的涂有日本识别徽号的运输机。这架飞机可能是刚刚飞到，也可能是要离开机场，因为舷梯尚未推走。空降兵指挥员迅速判断情况后，就带着一些冲锋枪手和一名译员立即扑向那架飞机。乘客乃是一些日本将军，纷纷下了飞机，不声不响地把武器放在空降兵脚前，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在这群穿草绿色礼服的人中，有一名高个中国人特别显眼。他戴一副角质框眼镜，一套考究的西服，紧裹着他那匀称而瘦削的身体。雪白的衬衣，上衣兜插着雪白的手帕，面庞细嫩，显然他在这座被炸得乱七八糟的机场上，同苏军空降兵饱经风霜的粗糙面孔相比，确实有点怪异。这个中国人比其随行人员高出一头，同他们迥然有别。他迈着敏捷的大步向苏联军官走去，到了那位军官面前就说起话来。

“中尉，请您翻译！”空降兵指挥员命令说。

“这个人说，他是‘满洲国’皇帝亨利·溥仪^①。他要
去苏军指挥部。他请求把他同日本将军们分开。”

这位皇帝显然是为自己的生命担心。看来，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把皇帝带上我的飞机，让乘务组负责警戒。对其他

^①亨利·溥仪就是爱新觉罗·溥仪。他同外国人交谈时自称亨利·溥仪。——译者

人，待我查明他们的身份后再作处置。”空降兵指挥员吩咐说。

这个饱经世故的军人脸上并未显出惊讶的表情。他可能在想，俘虏几个皇帝，这已不稀奇。即使溥仪说的全是实话，他也不会惊讶。溥仪本来不仅是“满洲国”的皇帝，而且是中华大国的最后一个皇帝。

在漫长的战争年代，这位到奉天作战的苏联空降兵军官已获得不少新素质，但他也彻底失掉了一种素质，即惊讶的能力。他目睹的事情太多了：被俘的德军元帅，烧焦了的戈培尔尸体，向苏军士兵谄媚的党卫军分子，祝福他们去建立“功勋”的教士，同集体英雄主义完全对立的无人性的残暴行径……

在溥仪的随从人员中有两个高级人物：伪满“帝室御用挂”吉冈将军（日本人）以及神道教祭祀府总裁——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将军桥本虎之助。

1928年和1945年在奉天发生的这两件事（张大帅被害和溥仪皇帝被俘），初看起来彼此毫不相干，实际上却紧密相联。为查出并向全世界揭示这两件事的联系，却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庭审于1946年5月8日在日本前陆军省大厅举行。陆军省位于东京废墟包围中的小山上。

这个宽敞而华丽的大厅，被按照纯美国气派连续整修了几个月，为进行历史性的审判，做了全部必要的准备。

十一位法官坐在高台的审判席上，他们身后是本国的国旗（苏、美、中、英、法、澳、荷、印、加、新、菲的国

旗，这十一国都参加了抗日战争）。稍低一些的地方是公诉方代表、辩护方代表、速记员和译员的席位。大厅的另一面也有一个不太高的平台，上面有两条长椅，坐着一些被告人，由身强力壮的美国宪兵看押，他们头带白盔、腿套白色护套。

右边是200个记者席位，记者有外国的，也有日本的。他们的上方是楼座，有300名盟国代表。200名日本代表。

在这所大楼里曾炮制并推行过侵略计划。现在，那些破坏和平与安宁、摧残人类的阴谋家却要在这里得到应得的惩罚。

总之，阴谋家已束手无策。国际公正审判这台复杂的机器在缓慢地运转着。需要再过四个月，即在九月，法庭先要查清二十年代后半期的一些事件。

参加诉讼的各大国的联合公诉代表——达西先生在起诉发言阶段继续证明被告人犯有阴谋破坏和平的罪行，即犯有准备、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罪行。他把一份编号为169的被认为有罪的文件放在法官席上，当年这是一份绝密的重要文件，现在历史学家都知道那就是1927年7月7日的《田中奏折》。

日本男爵田中义一将军当时任首相兼外相。他在奏折中向刚刚即位的裕仁天皇陈述了日本向外扩张的最高纲领。前一代的嘉仁天皇于1926年2月25日驾崩。新登基的裕仁天皇开始了日本纪年的新时代，即昭和时代。这个时代接替大正时代而延续到现在。

达西援引了这份奏折中最典型的几段文字：

“日本若不施行铁血政策，则不能消除东亚的困厄。但

若施行‘铁血’政策，则必将与美国相抗衡……若要掌握控制中国的权柄，则必须击败美国……

然而，为征服中国，则必先征服满洲和蒙古。为征服世界，则必先征服中国。倘若能征服中国，则其余亚洲国家和南洋诸国均将畏我并向我投降……

我们如能掌握中国的全部资源，即能转而征服印度、南洋群岛、小亚、中亚、甚至欧洲。假若大和民族愿意在亚洲大陆有突出作为，则夺取对满洲和蒙古的控制权乃是第一步。”

总之，根据田中首相制定的计划，规定了循序的、所谓分阶段的侵略活动，以便按日本帝国的需要完全重新瓜分世界。踏上这条道路的第一步应是占领满洲、外蒙和内蒙，这些地区是进一步扩张的跳板与基地。

田中将军也没放过苏联问题：

“为夺取北满的财富，看来还必须在蒙古大地上再次同俄国交锋，这一点也列入了我国发展规划。”

两年后，田中辞职，但他的计划却继续由日本各届政府始终不渝地坚定地推行着。而且这份凶恶至极、厚颜无耻的文件还被伪善的日本统治集团誉为“田中之积极政策”。

为什么田中计划中提出的第一步是占领满洲呢？为弄清这个问题，看看地图就会一目了然：满洲宛如一个巨大的楔子深深楔入苏联领土。苏联和满洲地区的边界线长达3,500公里。这条边界线当年连着苏联远东地区物产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几个省。紧靠边界处有苏联的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等大城市。这样，满洲对周围的苏联领土来说，就占据中心地位。这就使侵略者的武装

力量在有适当交通线的情况下，能对毗连的苏联领土的任意地点的最近作战方向实施突击。一旦得逞，就能截断苏联的重要交通线——靠近中苏边界上的黑龙江铁路、乌苏里江铁路和直接作为边界线的水陆，最后把苏联本土同其滨海地区分割开。

《田中计划》第一阶段另一个重要部分是占领“蒙古”，即侵占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一看地图就知道，占领内蒙以及满洲和朝鲜，就能使日本军国主义者进入长城地区，逼近北京。从战略方面来看，从那里向华北和华南实施强大的突击极为有利，那里有中国的最大城市、海港和最发达的工业区。

一旦占领了外蒙，就使侵略者有可能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干线，进入伊尔库茨克和贝加尔湖地域，从而夺占苏联的远东地区。

总之，《田中计划》的宗旨是极其明显的，但读者可能会问：这个计划同本书开头讲的日本的奴仆——满洲的独裁者张作霖之死有什么联系呢？问题就在于张大帅在他死前几年所奉行的政策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并不是出于原则性的主张，而仅仅是出于对个人功名的考虑。1928年，中国军阀（其中张作霖获得“中国统治者”的头衔以后起决定性作用）暂时联合起来反对国民革命力量，占领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当时，日本人已开始有理由感到担心。使日本国统治集团惊诧的是张作霖及其同伙开始日益积极地同美国勾搭，同英国拉关系。张大帅甚至请了一名美国顾问斯温赫多姆，他本人愈发不愿意扮演日本奴仆的角色。张作霖及其周围的人开始懂得，日本的控制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可克服

的障碍，因而会使他们失掉中国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支持，这就是说，会使他们想成为中国“国民”领袖的希望破灭。张大帅想利用日、美、英在中国的矛盾，在国家占据关键地位。

日本很容易就猜到了上述把戏，指责张作霖不会同国民革命力量作斗争、放弃北京、在满洲修筑同日本南满铁路竞争的另一条铁路、秘密同美国人谈判，此外还指责他犯有很多其他过错。

田中首相于1928年夏初向张作霖提出一份日本需求书。干过20多年土匪的张作霖本来同其日本主子交往甚密，曾真心实意地为主子效劳多年，但毕竟不太了解他在同什么人打交道。张作霖拒绝履行田中的要求。于是，当时就……然而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国际军事法庭的所在地——东京日本陆军省的华丽大厅。

证人席上有一位稳重的、白发苍苍的79岁的海军大将冈田启介。他理应回忆并讲些往事。从1920年至1936年他一直在日本历届政府担任要职，海军省次官、海相、高级军事顾问、陆相，最后于1934——1936年任首相。

在那和平事业岌岌可危的多事之秋，他的阅历可谓丰富。但很遗憾，他根本不赞成在法庭上始终需要说真话。他偏偏认为，说半真半假的话，甚至谎话连篇，让法官、各方和旁听者知道这些才好呢。

于是，冈田启介叙述了张作霖于1928年败于国民党之后，被迫撤军回满洲的经过。他继续说：“这时以东条将军为首的驻满洲日军及其司令部认为，就日本利益同张作霖合作并谈判，这种做法太慢。他们不愿等到谈判结束，迫不及

待地寻求以武力占领满洲的机会。”

问题很清楚，以东条为首的关东军首脑对张作霖不满，不相信同他进行的谈判，渴望军事解决，即占领满洲。冈田继续作证说，为达到上述目的，“关东军的一伙军官策划了杀害张作霖的阴谋……1928年6月4日他们安排了颠覆张作霖乘坐的从北京到奉天的火车的活动，其做法是把炸药放在轨道上。结果阴谋得逞，张作霖在这次颠覆中身亡。”

这些话似乎令人可信。但是，证人恰好在这里兜圈子。瞧，那些搞阴谋的军官在除掉张作霖之后，竟“能完全隔离（？）东条将军并割断（？）他同军队的一切联系。”

冈田自己前边已证明，东条极力赞成同张大帅完全断绝关系并以武力占领满洲，为什么还要“隔离”他、“割断”他同军队的联系呢？这一点，证人当然讲不出来。另外，他也讲不出几名军官在日军所特有的严格的军事纪律的条件下如何能把自己的司令官同当时的事件真正“隔离”开。

然而，证人证明，那样过分明显地、肆无忌惮地惩治张作霖已引起天皇和议会成员的不满。因此，田中首相、白川陆相和冈田本人（当时任海相）决定进行调查并对犯罪者采取“严厉的纪律措施”。但是，就连这个温和的意图也未能实现。为什么？冈田解释说，当“这个问题转交陆军省讨论时，就遭到参谋部与其他军官的强烈反对，结果田中一事无成。”

证人的话难以令人相信。田中毕竟是日本侵略和重新瓜分世界宣言的缔造者，他本人是不愿意查处按他指定的途径行事的人。要知道，张作霖被炸死的原因就是张企图抛掉日本傀儡的这套甲冑。

冈田的见解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是“田中内阁因无力控制和约束军队而于1927年7月辞职。”

实际上，田中内阁辞职的原因是由于他的政府在中国内地和满洲奉行侵略政策所遭受的一系列失败。

但冈田毕竟还证明张作霖之死是日本军阀一手干的，是张大帅不答应日本要求的结果。从《田中奏折》来看，这也不容争辩。

美籍律师沃伦进行了质证。

问：请您多讲些在满洲杀害张作霖的事。您有杀害张作霖的第一手材料吗？

答：我是海相。当时曾全面调查过这件事，我认为我得到的情报是准确的。

沃伦（对译员）：请您给他读这个问题，叫他回答，他有这次事件的第一手材料吗？

公诉人达西：庭长先生，我觉得证人已回答了这个问题。

庭长：让他再回答一次，以求准确无疑。

冈田：我没有第一手材料。

问：那么，您对这个问题的全部证言都是听来的，是不是？

答：是……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懂得这一手”，——庭长冒出一句讽刺话。

冈田海相掌握的是一份完整而准确的关于杀害张作霖的政府通报，可辩护人却把它与普通的传闻等同起来。辩护人在这次审判过程中，不止一次采用上述庸俗的诡辩手法。